

《九槍》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導演：蔡崇隆，出品年：2022，片長：103分鐘，語言：中文、越南語，出品者：蔡崇隆，出品國：臺灣，發行單位：公視

張容嘉

東華大學

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

獲得2022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九槍》，其敘事原型可追溯至2017年一則震撼社會的新聞事件：越南籍移工阮國非在河邊遭舉報疑似意圖竊車，隨後被警方追緝並連開九槍，且在延誤送醫後身亡。為何一名資淺警員會對赤裸的移工連開九槍？移工為何需要逃跑？真正「殺死」阮國非的，究竟是那九顆子彈，抑或是一套更龐大的制度與社會結構？成為導演蔡崇隆心裡深處的提問。

就觀影經驗而言，《九槍》是一部需要鼓起勇氣才能直視的作品。影片以長達三十分鐘的側錄影像，迫使觀眾同在觀看位置上成為「旁觀他人之死」的參與者，面對阮國非在鏡頭前翻滾與掙扎的身影，多數時刻，觀眾很難不想別過頭去；然而，影片也正是在這種倫理與感官的不適中提出反詰——看不見就等於不存在嗎？紀錄片固然無法回應或解釋所有問題，但其重要性在於迫使我們直面那些長期被忽視、被推離公共視野的「平行世界」，並承認觀看本身所牽涉的責任與位置。

《九槍》之所以不僅是一部關於移工死亡的事件影片，關鍵在於它將阮國非之死置入臺灣移工政策與治理體系的歷史脈絡之中。1992年臺灣通過《就業服務法》，作為引進外籍勞動力的基本法規，並以限期、限量等嚴格管制設計，企圖避免移工在臺「生根」。然而，廉價勞動力所帶來的結構性需求，使企業部門長期向政府施壓以擴大大額與開放產業類別；在放寬與緊縮的政策拉扯之間，移工人權從來不是談判桌上的核心焦點（簡永達 2023：89-93）。因此，即便三十年來稱呼從帶有污名的「外勞」逐漸轉向較中性的「移工」，語言的修辭更新並不必然轉化為制度平等的實質落實。在此意義上，蔡崇隆

在2025年於東華大學映後座談中特別強調以「無證移工」（undocumented migrant worker）指稱此類處境，刻意與官方及主流媒體慣用的「逃跑外勞」、「失聯移工」拉開距離。命名差異是涉及問題如何被定義的政治：前者指向制度如何生產非法化與脆弱性，後者則將處境歸咎於個體偏離、道德缺陷或違規行為。然而，若我們僅是將移工的「不告而別」理解為單純的「逃逸」事件，就很容易忽略更關鍵的提問：是怎樣的結構環境導致有人需要「選擇」以失去合法身分為代價，換取基本的生存空間？當「逃跑／失聯」甚至可由仲介登報，將原屬移民署管轄的行政管理，轉嫁為基層員警的追緝業務時，這種行政—警政的轉換難道就能為「追緝、開槍」提供合理刑事化的正當性嗎？

面對「阮國非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這一永遠無法被完全釐清的疑問，影片採取近似田野回訪的敘事路徑，試圖在真相結構性不可得的條件下，重建一個更接近人的生命輪廓。導演回到阮國非在臺鍋居的住處，透過司機朋友等人的敘述，呈現他嘗試學習寫字、並在工作團隊中被信任的形象；即便處於「無證」狀態，他與在地社會的日常互動仍形成某種脆弱卻真實的默契。影片更帶回阮國非在越南的老家，透過校園與家庭場景呈現其成長脈絡與未竟的生命可能：聰明年輕卻難以升學的遺憾、家庭經濟壓力下的跨國移動，以及兄妹相繼來臺的生計策略，使觀眾理解「出走」並非單一意志的浪漫冒險，而是全球勞動分工與家庭生存邏輯交織下的選擇。

然而，旁人的敘述終究無法完全代表阮國非。導演亦嘗試搜尋阮國非臉書，讓逝者以第一人稱的碎片發聲。片中摘錄阮國非臉書部分文字的獨白——「原來奴隸真的存在，沒想到自己一步步活成近似奴隸的處境」。展現制度性壓迫下，阮國非以近似奴隸的語彙來定義描述自己的生命狀態。這種處理方式，使影片在倫理上部分避開替死者說話，改以其自身文字作為理解個人的處境，凸顯結構如何在日常中滲入感受、尊嚴與自我認同。

《九槍》最具批判性的段落之一，在於它清楚指出移工的勞動已成為臺灣社會賴以為生的日常與建設：從城市裡的豪宅與大樓、重要交通工程、高山蔬菜與遠洋漁業，皆仰賴移工支撐。諷刺的是，這些臺灣社會裡不可或缺的年輕勞動者，卻經常在一樁樁工安事故、鐵皮屋大火或其他災害中以「無名者」的身分殞落消失於一閃而逝的新聞畫面。顧玉玲（2017：54-63）對於工殤碑的

研究即展現類似的情境，有些工殤紀念碑位於捷運站旁或大型工程現場，提醒民眾在享用建設成果時反思職災損害；例如台北市捷運象山站附近的紀念碑，紀錄2004年北二高支線信義快速道路工程灌漿時不慎造成之傷亡事件；另如雪山隧道工殤紀錄中，除臺籍工程師與勞工外，也留下多位泰籍勞工的姓名拼音。值得注意的是，多數碑文對外籍罹難者僅以羅馬拼音或中文音譯呈現，唯少數如「外籍勞工工殤碑」或「信義快速道路殉職碑」以移工母語（如泰文）刻名。這也說明即使在工殤紀念場域，移工仍處於公共記憶的邊緣位置。

當臺灣社會常以「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自稱時，影片逼問的是：這句話是否帶著條件？哪些人被納入「我們」的關懷與保障，哪些生命又被排除在可哀悼、可被視為同等「人」的範圍之外？若《九槍》讓觀眾難以再以「沒看見」作為理由，它所要求的也不只是同情，而是承認我們與結構的關聯，一起思考如何促成更友善的制度與生活環境，正視移工的勞動人權，並避免以刑事化語彙處理本質上屬於勞動與移民治理的議題。唯有如此，「不要再有下一個阮國非」才可能從道德呼籲轉化為可被追責、可被衡量的公共目標。

參考書目

顧玉玲

2017 工地無國界：尋找工殤紀念碑裡的移工。台灣人權學刊 4(2): 47-72。

簡永達

2023 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臺北：春山。